

# 日本军国主义幽灵渊藪靖国神社\*

——为“卢沟桥事变”日军大规模侵华战争60周年而作

王春良

## 一、一个严重伤害亚洲人民感情的政治问题

199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60周年。而在1996年11月28日,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议竟然作出决议,敦促外务省尽快实现让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该调查会会长、日本前外相中山太郎在发言中说,日本天皇和首相在出访外国时,都要慰祭外国战死者。但是外国领导人来日本访问却不参拜靖国神社。会议还把这种情况归结于日本外务省“过于担心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应。”<sup>①</sup>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方要求外国元首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作为执政党的日本自民党有关机构再次作出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人民感情的举动。”众所周知,靖国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二战甲级战犯的牌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关系到是否正确对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那段对外侵略战争历史。日本自民党的这种错误举动必然引起亚洲邻国的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sup>②</sup>

1996年7月29日,59岁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他生日那天参拜了靖国神社,从而引起中国、朝鲜、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强烈抗议。同时,也遭到日本和平遗族会、社

民党等组织、政党的诘责。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强调指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sup>③</sup>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严重伤害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政治问题。

## 二、靖国神社的产生及其军国主义性质

日本的靖国神社是1869年(明治二年)6月创建的。从1867年12月9日(阴历)“王政复古”政变建立明治政权,特别是1868—1869年的戊辰国内战争中,天皇军(当时主要是萨摩、长州两藩的讨幕军)打败幕府军,初步稳定明治政权过程中,天皇军(“皇军”)为明治政权的建立战死了许多官兵。天后制政府为使活着的军民继续矢志于天皇,决定对战死的“皇军”建立招魂社。根据明治天皇的旨意建立的东京(首都)招魂社,位于东京市中心千代田区九段北,是专门祭祀“阵亡将士”的场所。1879年(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

在日本,除了首都东京的靖国神社外,各地还建有地方性的招魂社。后来,地方上(道、府、县、村)的招魂社一律改称为“护国神社”,实际上,它是靖国神社的下属地方分社,最盛时全日本有十余万个。

\* 今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与二次大战爆发60周年。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为代表的右翼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即是中日关系史的“热点”,也是现代史教学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为此,我们特刊发王春良教授的这篇文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还在其侵占区建立了不少“神社”,如台湾神宫、朝鲜神宫、昭南神社(在新加坡)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8月)前的日本近代现代史上,天皇和历届政府统治者,建立和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仅仅为了宗教祭祀,而是有特殊作用的。它是日本统治阶级进行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的主要支柱之一。《靖国神社志》明书:“遵照(天)皇上睿虑,建立神社是为了安抚忠魂,永远供奉,使忠节益彰。”日本投降前的《修身》教科书则写道:“我们要铭记天皇陛下的厚恩,向被供奉在神社的人们学习,为天皇和国家尽忠。”简言之,天皇和日本政府通过靖国神社宣扬“为天皇制国家战死是最光荣的”。这也就是所谓“武运长久”的“大和魂”,也被称作是“日本国民精神”。

1869年6月,招魂社初建时,入祀招魂社的主要是1853年至1869年期间,“尊王攘夷倒幕”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特别是戊辰国内战争中为明治政权战死的“皇军”官兵。这期间那些为尊王攘夷倒幕而去世的“志士”,以及在明治维新初期为平定旧藩臣内乱、实现国家统一而战死的官兵被第一批入祀招魂社,据统计,约五万人的“亡灵”。

明治天皇及其政府决定建立招魂社,是与它大事宣扬“天皇系天照大神的子孙”、“神代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神道结合在一起的。

神道(世称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大致可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它是一种古老的多神教,声称“天地神祇八百万”,而其崇拜的中心是代表太阳神的“天照大神”。天照大神被尊为日本民族的祖神。在古代对神的祭祀一般由“祭主”、“宫司”、“祢宜”等在“神社”或“神宫”中举行。它的渊源是氏族社会人们的自然崇

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但是,到公元四世纪时,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成立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神道教体系,宣扬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因此,天皇是“神”,而不是普通的“人”,由此引伸皇统即神统。八世纪佛教在日本盛行后,神道与佛教相混合,并把许多神道之“神”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17世纪后部分神道学者汲取中国明朝朱熹理学思想,强调尊皇忠君,并主张神道独立,不与佛教混合。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后,实行神道与佛教分离,形成了“神(神道)皇(天皇)一致”、“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一大特点。

神道祭祀或参拜神的场所被称为“神社”。其中地位一般比神社高的称“神宫”(在8—12世纪时)。神社原为各村庄共同举行农耕仪式之处所,最初只有“神篱”(周围植常青树,中间清净土地为祭神处)、“磐境”(周围盘置石头,以岩石充神座)等,后来发展为建造房屋、神殿,按时祭神,并形成“招魂社”。

因此,从体制上说,近代天皇制国家是以神统和皇统为依据,使神道与佛教分离,禁止在神社的神龛上供奉佛像,从而建立“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的祭祀机构,是“基于神道和皇道的大教”的一部分,而不是佛教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也称“一国之祭庙”。实质上,明治天皇及其政府是要通过招魂、祭祀,来号召和激励活着的人为天皇及其政权效忠,实践为天皇制国家战死疆场是最荣耀的“国家神道论”,即军国主义思想体系。正是因为这样,招魂社创建十年后,才改称靖国神社,使其“名符其实”,形成了由国家管理的神道体制。所以,靖国神社本质上已不是宗教祭祀机构,而是天皇制国家的一部分。特别是天皇为加强对军队的

直接控制,使军队进一步直属天皇,1878年后,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从”为军人之根本,绝对禁止军人评论天皇。1882年1月,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宣告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为“武士道”精神,是军人必须遵守之“德目”,把日本军队正式称为“皇军”,把参谋本部直属天皇。随后,实际上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黷武思想和行动,形成了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架构。

明治维新以后,从19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便由原来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侵略的封建落后国家,逐步演变为侵略其邻国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了。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入祀靖国神社的“亡灵”几乎全是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军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帝国主义道路,1869年初便提出通过“征韩”来巩固明治政府。1875年,日军炮轰朝鲜江华岛,开始侵略朝鲜。1872年,日本强迫当时中国的藩属琉球为日本“藩属”,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用武力镇压琉球人民的反抗,侵占琉球,1879年废琉球藩而改为冲绳县。1874年,日军侵略我国台湾。同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陆军省官制”,规定陆军大臣从将军中任命。1878年11月,设立参谋本部,直属天皇。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招魂社于1879年明令改制为靖国神社,把征韩、侵台和镇压琉球人民反抗中战死的日军均入祀靖国神社。自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侵略战争:1894年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日军出兵镇压我国义和团运动,参与八国联军侵略我国,1904年为进一步侵夺朝鲜和中国领土而与帝俄发生日俄战争,1914年为夺取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诸岛屿的殖民地权益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8年日军侵战我山东济南,1931—1945年日本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中,日军战死的官兵都被入祀靖国神社,计有240多万名。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的13619名,甲午战后侵占我国台湾时战死的1130名,镇压义和团运动战死的1256名,日俄战争和镇压朝鲜人民时战死的88429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抢占德国殖民地和干涉苏俄出兵西伯利亚战死的4850名,侵占我国济南时战死的185名,“九·一八”事变以及侵战我国东北时战死的17161名,“七七”事变开始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至1945年以及太平洋战争合计战死的2,311,847名。

1978年秋,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战后“冷战”的国际形势,在美国之默认下,违背《神道指令》与《日本宪法》,竟将二战中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牌”塞进靖国神社,其中有先后担任侵华关东军司令、关东军参谋长、日军总参谋长、内阁首相的东条英机,曾任外务大臣、首相、扩大侵华战争主谋之一的广田弘毅,曾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的土肥原贤二,曾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的木村兵太郎,曾任上海方面军司令官、制造南京大屠杀罪魁之一的松井石根,曾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近卫师团长、侵占印度尼西亚的武藤章等。这些战犯均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这些所谓“英灵”,有些是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更多的是直接在国外进行抢劫、掠夺、奸淫、屠杀,血债累累的侵略凶犯。

天皇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非常重视对靖国神社的建设和祭祀(参拜)。二战前,天皇和日本统治阶级一直运用靖国神社这一类工具,他们每年春秋例行两次所谓“大祭”。祭祀仪式由政府主持,祭祀费用由国家支付。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以军国主义宣传毒化、

欺骗人民。平时,受军国主义毒化的日本人到了靖国神社,都恭敬肃然地合掌膜拜。不少头发花白的“老兵”去凭吊曾经一起作战时死去的“亡灵”。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在靖国神社,许多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以及所谓“遗族”趴在地上哭泣。那些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包括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首相近卫文麿、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等甚至切腹、服毒自杀“殉道”(神道),以示矢忠天皇。而这些战犯的“亡灵”都被入祀靖国神社。因此,靖国神社是名符其实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渊藪。

### 三、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说明了什么

日本天皇正是利用靖国神社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特别是在对外侵略战争高峰时期,天皇总是亲自参拜(“亲拜”)靖国神社。据统计,明治时期45年间,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七次。大正时期15年,天皇亲拜三次。昭和时期,从1926至1945年亲拜20次,平均每年一次。这时期正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天皇通过亲拜靖国神社,激发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气势,驱使国民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裕仁天皇第一次亲拜靖国神社是1929年4月26日,即“临时大祭”供奉出兵我国山东济南的战死者。第二、三次亲拜是1932、1933年4月26日,即“临时大祭”供奉“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战死者。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死的“皇军”与日俱增,从1938年起,每年春秋两季,靖国神社进行“临时大祭”,天皇总是亲拜。及至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1月20日,裕仁天皇还亲拜过一次。直至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发布《神道指令》,不再允许“祭政一致”,天皇才不得不停止亲拜靖国神社。

由于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因此在日本投降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1945年11月下令,停止国家

(日本政府)对神道和靖国神社的资助。盟军总部在实现日本非军国主义民主化的过程中,发布了《关于废除国家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之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布的指令》,简称《神道指令》。该指令虽没有完全废除国家神道,但明确规定神道、神社与国家分离,也就是“政道分离”,即政府、政治与神道、神社分离;不允许“祭政一致”,即不准以政府官员的政治身份去参拜、祭祀靖国神社。因此,《神道指令》是改变天皇制政治体制的民主措施之一,对日本人民的精神解放多少起到了一点进步作用。

根据《神道指令》,1946年11月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写明:“任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宪法第八十九条又写明:“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

由于《神道指令》和1946年日本宪法规定,宗教(神道)必须与国家分离,靖国神社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不得不按《宗教法人法》登记为“宗教法人”。这样靖国神社不再受陆、海军省(政府)管理,不再受政府的特殊待遇,终于在法律上被贬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法人。因此,在盟军(主人是美军)占领日本初期的民主化过程中,神道和靖国神社的活动确曾有所收敛,居心叵测的政客和军人不敢公开利用靖国神社与神道作为政治工具了。

然而,盟军总部和麦克阿瑟控制下的日本占领当局,既没有彻底“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当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复活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宣传。麦克阿瑟说:“只要教会与国家分离开,神道祭官就被允许继续进行传教。”而实际上,在二战后,在残存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神社分子的活动下,有不少神社,对

《神道指令》始终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抵制。而这种活动的起伏,恰恰是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沉浮相呼应的。1963年4月,靖国神社竟然起草了一个要求由国家重新“护持”的纲领。1965年,又以“民间实团”日本遣族会的名义提出了《关于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的调查报告》。一小部分右翼分子企图复活战前国家与神道神社的结合关系,他们重又宣扬:“只有到日本以国家名义奠祭靖国神社中的亡灵的时候,这些亡灵才能得到安息”的“祭政一致论”。1969年,自民党的一些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把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并由国家护持的法案,再次企图使靖国神社恢复到战前的那种特殊地位。但该法案前后提过五次,都因遭到其他党派议员的反对而未被通过。然而,1974年,靖国神社还是重建并扩大了。

1974年重建的靖国神社正门的大牌坊,高25米,椽长34米,以铁铸成。可见其“高大巍峨之势”。进正门牌坊以后,有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里面供奉着2,464,151名日军官兵的“灵牌”,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牌”。

靖国神社大门外左右各有高十余米的石塔,这是1935年所建,石塔的塔座上各有八面青铜板制作的浮雕,其内容绝大多数是为日本对外侵略、特别是对朝鲜、中国侵略“歌功颂德”,其中有日军侵台、炮轰沈阳城、攻占长城、轰炸苏州等浮雕画面。正殿前的木制大牌坊是用中国台湾阿里山的名贵木材建成的。在“宝物遗品馆”有两扇门板,是当年侵台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台北驻地用过的床板。展出的“宝物”中还有日军在中国“北海湾敌前登陆图”、日军进攻南京及登上南京中华门等图像。这里还陈列着一架日军“神风突击队”队员使用过的飞机,还有切腹自杀的将军留下的血衣,一辆在塞班岛争夺战中被摧毁的坦克,日本历代的武器

装备以及侵略战争中抢掠来的军用品,写着“武运长久”的军旗、军刀,战死军人的许多遗像遗物等等。这些建筑和陈列物,充分说明靖国神社是宣扬军国主义武士道侵略扩张的场所。

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在“终战纪念日”(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但他宣布不是以首相身份参拜,而是以私人身份参拜,以表示“政祭分离”、“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然而,这却是二战后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个日本首相。之后,日本一些公职人员去参拜靖国神社都宣称以私人身份参拜。这实际上是以逐渐地、渐变的形式搞靖国神社的“复权”与“公式参拜”。因此,在日本国会内外,反对靖国神社“复权”与“公式参拜”的斗争也随之激烈起来。

1979年6月14日,众议院法制局局长大井民雄以“谈谈有关天皇和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家机关到靖国神社参拜的论点”为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作为公人(政府官员)到靖国神社参拜,从宪法第二十条第三项(即: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规定来看,还是有问题的”,“到靖国神社公式参拜的实质意义,应该看作是国家要公开承认它跟靖国神社所祭祀的神有关联这种意思的表现”,“跟天皇、内阁总理大臣以私人资格参拜有质的不同,等于是宪法第二十条第三项所说的国家及其机关进行宗教活动,同政教分离原则相抵触,是不能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宪法的。1980年底,日本政府在发表的“统一见解”中也说,“不能否定正式参拜没有违犯宪法之嫌”。但是,日本政府某些官员无视宪法之规定,不顾舆论的反对,仍不断前往靖国神社参加“慰灵祭”。

198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后,遭到中国、朝鲜、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此后11

年,在职首相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8月15日,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他还当过法务大臣和文部大臣)在参拜靖国神社时竟颠倒黑白地说:“日中战争发端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本来已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了枪,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88年4月22日,奥野又诡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1995年1月,自民党国会议员还组成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由奥野任会长。该联盟竭力叫嚣反对国会通过“谢罪式的不战决议”,以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1996年6月,奥野诚亮等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还成立了旨在“重新看待历史教育”等问题的“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该联盟宗旨宣称:“决不赞成把我国(日本)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sup>④</sup>

1996年7月29日上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桥本对记者关于这次参拜是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参拜的提问的回答是:“怎么说都行。”不过在参拜登记时,桥本却写上了“内阁总理大臣”。桥本对提问的记者说:“因这种行为(参拜)而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应该结束了。迄今为止我每次参拜时都写明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当了‘总理大臣’就写‘总理大臣’。”然而,桥本在1996年5月27日曾表明过不在8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意向。他当时说:“既然进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他同时也表示,“并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sup>⑤</sup>

其实,桥本的参拜靖国神社并非偶然。正如他所言,“迄今为止我(桥本)每次(多次)参拜靖国神社”。1995年年中,针对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桥本龙太郎等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竟然有“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

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歪曲历史、妄图恢复军国主义的言词。

对于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靖国神社里祭祀着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头目的亡灵。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历来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及政府领导人前往参拜,桥本首相前往参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应当真正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香港报纸指出,桥本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亚洲人民的“挑衅行动”。“桥本作为一个在当上首相之前就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右派分子,在1994年声称日本当时作战是针对西方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就已经引起了争议。……他通过自己的挑衅性的参拜重新撕开愈合得仍然很慢的战时伤口。”<sup>⑥</sup>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中社评论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对朝鲜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侮辱,是不能容忍的。”这一行动是日本反动派在政治上怀有罪恶企图的一部分,他们的罪恶企图是想实现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sup>⑦</sup>韩国外交部指出:“如果日本想和邻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它就应该尊重那些过去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国家的人民的感情。”<sup>⑧</sup>而桥本的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

新加坡舆论指出:“因为每年都有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列队到靖国神社,作‘二礼、二击掌、再一礼’的神道教大礼。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使人即刻联想到登机告别前的‘神风’队员、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东条英机等二战头头。这次新上任的桥本龙太郎首相,竟然又重演11年前‘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亲自到靖国神社拜祭的风波,就只有加深亚洲对日本的防范,世界对日本的警戒。”文章还论析了日本的媒传在“指责桥本首相到靖国神社

去拜祭之不是,是避重就轻,没有指出问题的根源,反而被国粹主义者利用为制造排外心理”。这样,“在8月15日纪念战争牺牲的故人时,原本应该谴责战争、珍惜今日的和平,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同情心,转变为对供奉东条英机等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拜祭和悼念。”因此,人们不能不把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当作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和基本政策走向来看待了。”<sup>⑧</sup>

桥本的参拜靖国神社也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1996年7月29日就首相桥本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表抗议声明:本会“意识到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民众负有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铭记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的痛苦,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争取走上共存的道路。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称阵亡者为‘英灵’和美化侵略战争。”<sup>⑨</sup>日本《赤旗》报则指出:现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也不管是在终战纪念的8月15日那天还是别的日子,都是违宪的行为。现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美化侵略战争,完全违背了基于对战争的反省而确定的宪法的和平原则。虽说没有付“香火费”和避开了8月15日这一天,但是,违反宪法的本质没有变。<sup>⑩</sup>

日本社会党(现为社民党)人对桥本的参拜也深表不满,认为:它加剧了执政党内部的矛盾。社民党阁僚表示,继1995年之后,无一人去参拜靖国神社;新党魁党的田中秀征经企厅长官也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以表示反对和批判桥本的参拜。然而,在自民党内,进入1996年8月以来,法务大臣长尾立子和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冈部三郎参拜了靖国神社。8月15日,又有6名日本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这6名大臣是自治大臣仓田宽之、科技厅长官中川秀直、农林水产大臣大原

一三、通产大臣塚原俊平、防卫厅长官白井日出男和运输大臣龟井善之。此外,分属自民党、新进党和先驱新党的共80多名国会议员也在这天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靖国神社祭祀着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头目的亡灵,日本一些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的作法再次伤害了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表示愤慨。

199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的历史观必须清算”。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表演再次提醒人们,对日本政治的走向,必须密切关注,不可掉以轻心。靖国神社是日本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的象征;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检验日本政要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试金石。日本一帮右翼政客置广大亚洲人民的感情于不顾,在每年都选择8月15日前往靖国神社,向战争罪犯顶礼膜拜。说穿了,这是向亚洲人民示威,向国际社会挑战,同时也是他们的反动政治心迹的大暴露。如今在世界各地,公然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几近绝迹。唯独在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奇谈怪论居然能够肆意横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丑行居然敢于在光天化日下表演。此等怪事出现在日本绝非偶然。这是日本反动的历史观没有得到清算的必然结果,是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突出表现。

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日本某些人更加放肆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有的政党公然向1946年制定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挑战,要求修改“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重要条款,放弃“专守防卫”。有的甚至说当年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国战争犯罪的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否认审判的正义性,因而拒绝承认对战争罪犯的判决。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气焰极为嚣

张。这表明,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妄图重温征韩、侵华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日本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只有彻底清算反动的历史观,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桥本这次参拜很可能为历届内客所放弃的“首相参拜”重新开辟道路。也可以设想,首相以神道形式进行参拜,会使国内围绕宪法展开的“政教分开”的议论重新高涨起来。可以说,这是孕育着很多危险的选择。<sup>⑨</sup>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高碕宗司指出,日本领导层不断大放厥词的根由,就在于日本人还没有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和真正地反省。日本在战败后既不承认殖民统治的不正当性,而且确立了通过外务省和大藏省文件把殖民统治继续正当化的立场。早在1953年10月举行第三次韩日会谈时的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也有给朝鲜人带来好处的一面。”至今,日本领导层中仍存在此类厥词。高碕宗司教授认为,为了斩断大放厥词的根基,必

须通过历史教育给(日本)国民以正确的认识。<sup>⑩</sup>

由上可见,对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来说,特别是在“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与二次大战60年之际,对以桥本首相为代表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决不能掉以轻心,务必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挑衅行动。

注:

①《人民日报》1996年12月2日报道。

②《人民日报》1996年12月3日报道。

③《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6日报道。

④日本《朝日新闻》1996年6月5日报道。

⑤时事社东京1996年7月29日电。

⑥香港《南华早报》1996年7月31日社论。

⑦美联社汉城1996年7月31日电。

⑧法新社东京1996年7月30日电。

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4日报道。

⑩新华社东京1996年7月30日电。

⑪日本《赤旗》报1996年7月31日报道。

⑫日本《朝日新闻》1996年7月30日报道。

⑬韩国《东亚日报》1996年8月8日报道。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

(上接第13页)艺术发展起来之后才完成。因此,根据客观的审美关系历史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总结新的审美现象、发现新的美学范畴、补充已有范畴的内容、不断地丰富逻辑的中介,完善现代美学的体系,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美学体系不是美学研究的终结,而永远是开始。

综上所述,辩证思维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美学研究历史的必然归宿,也是美学研究中最高级的思维方法。其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和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对于美学研究更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按照辩证思维的方式构建美学理论的体系,使之

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特征,是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必由之路。科学的美学体系具有极为可贵的预见性和启迪意义,它呼唤着所有美学工作者向广大的美的未知领域不断开掘。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84页。

②〔苏〕亚科夫列夫《美学的方法与研究对象》,见文化艺术出版社《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

③〔日〕竹内敏雄《美学方法论的确定》,见上书。

④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